

# 「文学病」的转变

张怡微

2018年秋天，日本有一部电视剧《大恋爱：与将我忘记的你》播映。都市剧的外壳，说的是“阿尔茨海默病”与恋爱的故事，很有意思。尽管“阿尔茨海默病”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、电影、电视剧中，悲剧要远远多于喜剧。《大恋爱》却可算是一部带有轻松喜剧色彩的爱情挽歌，“我想趁着还有感觉的时候和你一起快乐地生活”，算是这一门类浪漫化搬演的突破。因为时间不够用了，所以才要拼命生活，与当下年轻人缺乏生活热情的精神状态也不太一样。电视剧里，落魄的小说家因为女友的病得了芥川奖，就连女主角的母亲都找到了第二春。

在“阿尔茨海默病”成为作家热爱书写的对象之前，我们更容易在文学作品里看到的艺术病症是“肺结核”。“肺结核”似乎与作家、艺术家有不解之缘，济慈、雪莱、夏洛蒂·勃朗特、契诃夫、卡夫卡、鲁迅、郁达夫、萧红都得过肺结核。肺结核病人常有持续低烧、恶寒、虚弱、消瘦、咳嗽、脸色苍白、面颊潮红等体表症状，会引发特殊的心理生理反应：敏感、易激动、性冲动等亢奋、烦躁、偏执等等。这些体表症状和生理心理反应于是被人们描绘成“艺术家气质”或“诗人气质”。艺术家的作品也会多多少少折射这种气质。

作为文学病的“肺结核”，无论论者是肺结核患者还是作者写作的人物得了肺结核，都已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，令人联想到现代主义。“肺结核体质”似乎就意味着情绪极不稳定、容易爆发、容易失控，在与两性关系的另一方剧烈冲突后，又逐渐恢复平静。与“肺结核”疾病的隐喻关系很大研究者是苏珊·桑塔格，通过文学、文化的角度探讨之后，肺结核本身所蕴含的情感隐喻得到充分的阐发：（肺结核）被理解或曾经被理解为激情的疾病。肺结核发热是内部燃烧的表征，结核病人是某个被热情“消耗掉”的人，这种热情导致身体熔化。利用从肺结核那里得到的隐喻来描写爱情——一种“有病的”爱情的形象，一种激情“消耗掉”的形象——远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了……就像《魔山》一个人物所做的解释：“疾病的症状无非是被掩饰起来的爱情力的宣示；所以疾病都只是变形的爱情。”……就像肺结核被当成一种激情的病来看待一样，它同样被当成一种压抑的疾病，……以前也曾被解释成为沮丧的恶果（《疾病的隐喻》）。

小说《长恨歌》里有一个中苏混血儿“萨沙”就得过肺结核，他的个性完全符合刻板印象中的结核病人。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第一次把闺蜜张永红带到家里来的时候，王琦瑶觉得张永红的病态，希望薇薇不要和她来往。但薇薇觉得张永红“有一股高贵的气质”。不出王琦瑶所料，张永红家人得过肺结核。《长恨歌》中这种“结核病菌”的气息，与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六六粉、樟脑丸一样，是病态与腐败的符号。如今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，传染病控制的严格，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不少，老年病更为多见了。在我们熟悉和了解“阿尔茨海默病”之前，其实我们已经也很少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“肺结核”影响了我们的友情、爱情。

因为其他肿瘤缺乏美感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浪漫爱情片年轻人最容易得的是白血病人，女主角脸色煞白地晕倒在男主角的怀里，迎合了通俗剧的口味。但是，如果作者想要渲染一种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感情，或者是凸显从不理解到怜悯到反思的人生态度的转变，再或者是想要描述能够预期的病情缓慢恶化、人却无能为力的绝望，“阿尔茨海默病”就脱颖而出。所以我们看到了韩国电影《我脑海中的橡皮擦》，看到了井上靖的自传电影《记我的母亲》，看到了朱莉·摩尔凭借电影拿到奥斯卡金像奖影后、金球奖影后的《依然爱丽丝》。

其实，上海女作家书写过“阿尔茨海默病”也比较多，如2010年王周生的小说《生死遗忘》，2015年薛舒的非虚构作品《远去的人》，2018年于的小说《查无此人》，都是女作家书写遗忘的男性（丈夫、父亲）。疾病，经由作家的书写不断提炼着新的意义。上海女性为“阿尔茨海默病”的情感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样本。疾病为人提供了逃避现实、或是给急速奔跑的生活一个终止进步的契机。而临终则会触及谅解、救赎、再也不能实现的愿望和欲望落空的永恒的遗憾。“阿尔茨海默病”之类的神经退行性疾病，它的到来必将历经等待的煎熬。它的病态还和早年创伤有关（如早年患有焦虑或者抑郁病史的人晚年得“阿尔茨海默病”的可能性更大）。早年创伤又会和历史有关，于是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。

“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：那个小姑娘是谁？父亲叫我‘小姑娘’”（《远去的人》）……疾病与亲情的联结如此通俗又一再地震撼人心。它似乎在提醒我们，除了病人本身承受的痛苦，照护病患的家属同样经历着巨大的、复杂的情感伤害。这种伤害既来自于遗忘，也来自于家族记忆的痛史，涉及父辈家族的离散、情感的迁移（继母前夫终于把爸爸/丈夫还给了我）。当我们确凿的爱的记忆被击为残片，比旁观亲人身体的衰败更为难熬的，是直面灵魂破碎的孤独。

向唐门迹往右沿着蓬莱岛的方向，经过“九八屋”才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：“赏梅”。梅花的品名依次有浜千鸟、冬至、丰后、开运、鹿儿岛红、素心腊梅、白难波等，素心腊梅的花瓣几近透明，鹿儿岛红的明艳可谓薄而出，白难波身形矮小，花瓣若隐若现。

出梅林，走上一段无人的山丘，中间的一大块空地就是八卦堂迹，顺着爱宕坂旁边的小路下来，从正面领略这迷你版的“京都爱宕坂”，有四十七级约一米宽的陡直的石阶，顺着出口的方向，看到了圆月桥，上了西湖堤，唯独没去得仁堂。

两小时的闲散也算是求仁得仁了。唐门与内庭之间用一条小路隔开。内庭里设有富士见堂，留有藤田东湖的

# 馅饼记俗

谢冕

在北方，馅饼是一种家常小吃。那年我从南方初到北方，是馅饼留给我关于北方最初的印象。腊月凝冰，冷冽的风无孔不入，夜间街边行走，不免惶乱。恰好路旁一家小馆，灯火依稀，掀开沉重的棉布帘，扑面而来的是冒着油烟的一股热气。但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。牛肉大葱，韭菜鸡蛋，皮薄多汁，厚如门钉。外面是天寒地冻，屋里却是春风暖意。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被端上小桌，就着吃的，可能是一碗炒肝或是一小碗二锅头，呼噜呼噜地几下下去，满身冒汗，寒意顿消，一身暖洋洋。这经历，是我在南方所不曾有的——平易，寻常，有点粗放，却展示一种随意和散淡，充盈着人情味。

我在京城定居数十年，一个地道的南方人慢慢地适应了北方的饮食习惯。其实，北方、尤其是北京的口味，比起南方是粗糙的，远谈不上精致。北京人津津乐道的那些名小吃，灌肠、炒肝、卤煮、大烧饼，以及茄丁打卤面，乃至砂锅居的招牌菜砂锅白肉等等，说好听些是豪放，而其实，总带着一股大大咧咧的“做派”。至于许多人引为“经典”的艾窝窝、驴打滚等，也无不带着胡同深处的民间土气。在北方市井，吃食是和劳作后的恢复体能相关的活计，几乎与所谓的优雅无关。当然，宫墙内的岁时大宴也许是另一番景象，它与西直门外骆驼祥子的生活竟有天壤之别。

我这里说到的馅饼，应该是京城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，是一道充满世俗情调的民间风景。基于此，我认定馅饼的“俗”。但这么说，未免对皇皇京城的餐饮业有点不恭，甚至还有失公

# 拨算盘

褚半农

使用算盘，上海方言中称“拨”算盘，这比用“打”字要准确得多。算盘上的上下两档珠子，只有用手去拨，它们才会动，拨上拨下，拨左面拨右面，一个“拨”字可以全部解决。由此还产生了好几个方言熟语、俗语，如用来指责某人工作不主动，或形容毫无主动性，就称“不拨不动”、“拨一拨、动一动”，甚至直接称某人“像个算盘珠”。

1950年代，小学三年级开始，算术课上开始有珠算——学习拨算盘的专业课，一周一次。第一节课，老师拿来一个大算盘挂在黑板上，一个小算盘放在讲坛上。他先不是让学生学计算，而是先练基本指法，要求拨的动作一定要规范。说拨算盘珠只需右手的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，尤其强调用食指和中指上下开合来拨动算盘珠，上档的两粒珠，只能用中指上下拨动，千万不能用食指，而下档的算盘珠向上拨只能用拇指。老师一边说，一边在大小算盘上演示，大算盘上的珠子只能表示个位置，它们被档上的毛条挡住了通道，拨上、拨下后就停留不动了。讲指法要领时，他就拿起小算盘，噼噼啪啪拨给我们看，算盘珠就发出有节奏而清脆的声音。老师说起来便当，看他拨时也便当。初学的我们感觉十分别扭，反而觉得不用中指可以嘛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拨起来还要快一点。但老师说必须要坚持，不然是“学勿出师”的，还说不会用三个指头拨算盘的人，长大了没有人家要你当会计的。有的小伙伴听话，下课后也会空手练动作，好像明天真的好去出师做会计了。以后从最初的加法学起，进而减法、乘法，还有除法。最常用的是前三种，最缠的是减法，口诀中的“退”啊，“还”啊，有的还有个“去”字，如“九退一还一”“九退一还五去四”，都同指法和数字有关，一不小心就拨错了。最难的是除法，难在一时记不住那么多口诀。我们手里也来不及，算盘珠发出的声音闷而不连贯，像是在打冷枪。

在算盘上做游戏，也许是个创造，但已不知是谁兴起的，可能是某个家长教给子女后带到学校来的，是另一种流传有序。反正当年小伙伴们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平。开头我说了馅饼给我热腾腾的民间暖意，是寒冷的北方留给我的美好记忆。记得也是好久以前，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来看我，我俩一时高兴，决心从北大骑车去十三陵，午后出发，来到昌平城，天黑下来，找不到路，又累又饿，也是路边的一家馅饼店“救”了我们。类似的记忆还有卤煮。那年在天桥看演出，也是夜晚，从西郊乘有轨电车赶到剧场，还早，肚子饿了，昏黄的电石灯下，厚达一尺有余的墩板，摊主从冒着热气的汤锅里捞出大肠和猪肚，咔嚓几下下去，加汤汁，垫底的是几块浸润的火烧。寒风中囫圇吞下，那飘忽的火苗，那冒着热气的汤碗，竟有一种难言的温暖。

时过境迁，京城一天天地变大变大，也变得越来越时尚了。它甚至让初到的美国人惊呼：这不就是纽约吗？北京周边不断“摊大饼”的结果，是连我这样的老北京也找不到北了，何况是当年吃过馅饼的昌平城？别说是我馋的想吃一盘北京地道的焦溜肉片无处可寻，就连当年夜间路边摊子上冒着油星的馅饼，也是茫然不见！

而事情的转机应当感谢诗人牛汉。前些年牛汉先生住进了小汤山的太阳

城公寓，朋友们常去拜望他。老爷子请大家到老年食堂用餐，点的就是城里难得一见的馅饼。

老年公寓的馅饼端上桌，大家齐声叫好。这首先是因为在如今的北京，这道普通的小吃已是罕见之物，众人狭路相逢，不免有如对故人之感。再则，这里的馅饼的确做得好。我不止一次“出席”过牛汉先生的饭局，多半只是简单的几样菜，主食就是一盘刚出锅的馅饼，外加一道北京传统的酸辣汤，均是价廉物美之物。单说那馅饼，的确不同凡响，五花肉馅，肥瘦适当，大葱粗如萝卜，来自山东寿光，大馅薄皮，外焦里润，足有近寸厚度。佐以整颗的生蒜头，一咬一口油，如同路边野店光景。

这里的馅饼引诱了我们，它满足了我们的怀旧心情。此后，我曾带领几位博士生前往踩点、试吃，发现该店不仅质量稳定，馅饼厚度和品味依旧，且厨艺日见精进。我们有点沉迷，开始频繁地光顾。更多的时候不是为看老诗人，是专访——为的是这里的馅饼。久而久之，到太阳城吃馅饼成了一种不定期的师生聚会的缘由，我们戏称之为“太阳城馅饼会”。

面对着京城里的滔滔红尘，遍地风雅，人们的餐桌从胡同深处纷纷转移到摩天高楼。转移的结果是北京原先的风味顿然消失在时尚之中。那些豪华的食肆，标榜的是什么满汉全席，红楼宴，三国宴，商家们竞相炫奇出招，一会儿是香辣蟹，一会儿是红焖羊腩肉，变着花样招引食客。中关村一带白领们的味蕾，被这些追逐时髦的商家弄坏了，他们逐渐远离了来自乡土的本色吃食。对此世风，也许是“日久生情”吧，某月某日，我们因与馅饼“喜相逢”而突发奇想，为了声张我们的“馅饼情结”，干脆把事情做大：何不就此举行定期的“馅饼大赛”以正“颓风”！

当然，大赛的参与者都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中人，他们大都与北大或中关村有关，属于学界中人，教授或者博士等等，亦即大体属于“中关村白领”阶层的人。我们的赛事很简单，



# 后乐园赏梅

颜夕子

走。这时两个中年人朝我这个方向走来，说着中文，我很自然地打了一声招呼：你们好！他们也回应着“你好”。听到女的对男的说：“你看那一对石狮子被风化成什么样子了！”然后我听到女的好像是问我：需要帮你拍照吗？我微笑着摇头。

走过驻步泉，路边立着“竜田川”的指示牌，上面介绍川边有枫树、桂花树等古木茂生。这段并不长稍有曲折的水流被分成两段，上段叫驻步泉，下段叫竜田川。顺着水流继续右走，是一条被称为具有中国风的“延段”（大意与“曲径”相近）——由切石和玉石组合成整齐而平缓上升的台阶（“切石”指经过加工的石头，“玉石”指天然的、圆形或椭圆形石头），路的尽头是“白云台迹”。原路折回之后走左边是“木曾山”。真正的木曾山被称为日本屋脊，木曾道是17至19世纪连接京都与东京的交通要道。后乐园中

的木曾山、木曾川体现了庭园文化中常见的“以一座山水容万景气象”。小石川的木曾山不过是一垄小丘，因为这里树木繁多，光影在参天古木之间斑驳，溪流伴着小路，让人联想起木曾道。后来，这里集中种植了几棵棕榈树，又称为棕榈树山。这个名字倒更通俗。泉水流经木曾山的部分就叫“木曾川”，这里有一个小小、小小的瀑布，用和制汉字命名为“寝覚の滝”（Nezame-no-taki）。提示牌上有这样一段英文：Please stop here for a moment to listen to the nice sound of water falling. 以前观瀑布大抵都是“远望”，飞流直下的壮阔，让你感受到山与水的合力。今天的瀑布需要“静听”，在几股细流玲珑曲致的低唱中，让你体会到芭蕉俳句中那种寂静中蕴含的生机。

听完瀑布，看到“唐门迹”，这时我才明白为何驻步泉碑文中的“左”成了我的“右”。“唐门”才是当年后乐园

的正门；there used to be a gate of the entrance of “Korakuen” garden. It was a gorgeous gate with colorfully lacquered carvings in Chinese style. 门上有朱舜水的真迹，毁于二战时东京大轰炸的战火。

后乐园始建于1625年，水户第一代藩主德川赖房从京都请来工匠，利用该处原有的古木设计修建。到德川光国时，此处成为著名的赏花之所。1670年，德川光国请朱舜水重新规划，在园中增设了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园林景致，如居于中心位置的蓬莱岛、还有得仁堂、西湖堤（横仿苏堤）、八卦堂、圆月桥等。朱舜水给庭园取名“后乐”二字，本是从自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1923年3月7日，后乐园被指定为国家史迹和名胜。

唐门与内庭之间用一条小路隔开。内庭里设有富士见堂，留有藤田东湖的